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出入于中西之间

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

马学强 张秀莉著



CHURUYUZHONGXIZHIJIAN
JINDAISHANGHAIMAIBAN
SHEHUI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入于中西之间： 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

马学强 张秀莉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祆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 年 12 月 24 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0 页。

目 录

导论	1
一、买办的职业、角色与形象变化	2
二、社会与文化视野中的买办生活研究	14
第一章 买办：一个新阶层在上海的兴起	22
引子：发现上海	22
一、早期上海的买办	25
二、江浙籍买办的崛起	36
三、买办队伍的更新换代	42
第二章 教育背景与买办职业的关系	72
一、从“广东英语”到“洋泾浜英语”	74
二、早期买办与后期买办的教育差异：以买办家族为例	77
三、买办获得教育的途径	81
四、教育的影响与意义	110
第三章 对买办收入的解读	134
一、不同行业的买办收入	135
二、买办从事商业经营的收入所得	166

三、附股外商企业的收入	186
四、投资近代民族企业的收入	201
第四章 买办：财富的极大拥有者	232
一、总收入与财富积累	233
二、买办的资产与信誉状况：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相关 调查	237
三、仇富与劫富：有关买办的绑架案	244
第五章 买办的消费与日常生活	254
一、巨大的消费能力	255
二、坐拥豪宅	259
三、出行：中国最早的“有车一族”	272
四、衣食习惯与习俗风尚	276
第六章 买办的家庭结构与婚姻状况	294
一、买办的家庭与家庭结构	294
二、买办的婚姻圈	309
三、家规与门风	315
第七章 买办的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	328
一、天主教徒	329
二、信仰基督教	337
三、佛教徒的信仰	341
四、崇奉道教	348

附录 1	买办契约书式例	367
附录 2	近代上海买办名录	375
附录 3	1920 年以“华经理”身份出任上海总商会会员名单	425
	1927 年以“华经理”身份出任上海总商会会员名单	426
附录 4	1941 年版《上海重要人名录》所载买办、华经理通讯处 及住址	427
附录 5	外商行号中英文行名对照表	440
参考文献		461
后记		479

导 论

人们在评价晚明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的作用时谈道：“使得东西两大文明得以越过‘万丈深渊’而相遇和交流的，是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开明开放’精神。是它们构筑了跨越‘深渊’的‘桥’。”^[1]在东西方架起的这座“桥”，是由一些学者誉为“巨人的一代”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以及他们的中国朋友们所成就的。西方传教士的这些中国朋友们，就包括来自上海的徐光启。那一段中西两大文明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营养的历史，曲折迂回，弥足珍贵，且也留下了不少生动有趣、极富戏剧性的回忆。

几个世纪过去了，东西方社会继续依循着各自的逻辑运行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格局大变，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导致中国在战争中一败再败。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门洞开。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已迥然不同于数个世纪之前的情势了。坚船利炮装备下的西方军队气势汹汹，在他们的掩护中，外交官来了，洋商来了，传教士又卷土重来。这些人来华的使命不同，目的各异，与他们打交道的也是不同的中国人。这一时期，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买办。

一、买办的职业、角色与形象变化

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兴起的一个阶层,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有争议的人群之一。有人说它是“洋奴”,有人更极端的称其为“卖国贼”、“帝国主义的走狗”;另一种评论则截然不同,认为买办是中外通商的居间人、中间人,是东西两种文化的中介人、线人,一些学者则基于他们“作为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人,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而评价其为“东西间的桥梁”。^[2]

对买办认识上的分歧及所构造形象的差异,源于不同的视野与语境。已有的买办研究成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3]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的语境下对买办论述的泛政治化,使买办在社会大众中留下了“概念化”、“脸谱化”的印记。

事实上,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初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百年来买办的作用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买办的认识也一直在改变之中。对这一过程的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买办的产生背景、职业特征及所担当社会角色的转变,而且也可以明晰在不同语境下买办形象的演变。

1. “摆渡”与买办

开埠初期的上海,对买办有不同的称呼,如“康八杜”、“康白度”、“糠摆渡”、“糠摆度”等,皆系译音。杨勋的《别琴竹枝词》有:“多少洋行康八杜(当手也,粤人呼为买办),片言茹吐费疑猜。”《沪游竹枝词》谓:“糠摆度名不等闲,宁波邦口埭香山。逢人自诩瓜瓜叫,身列洋行第几班。”《洋泾浜山歌》中有“洋行买办糠摆渡